



风云传记系列

● 张宗昌受的致命一弹是步枪子弹，而郑继成拿的却是手枪，很明显，刺杀的背后，还有很多谜团。  
● 韩复榘素来瞧不起蒋介石，他毫不客气地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但南京丢失是谁的责任呢？

# 草莽枯荣

## 死于非命的中国军阀

聂茂  
李太保 著

广州出版社

651821



1920 年的奉系主帅张作霖



1920 年的直系首领吴佩孚



1920 年的皖系大将徐树铮



桂系军阀开山祖陆荣廷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通电与奉系决裂，将所部改编为5个军，统称东北国民军，图为郭松龄



直系军阀首领曹锟



1926 年的孙传芳



1928 年的直魯聯軍首領張宗昌



1917年，各省督军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时的合影



奉系“少帅”张学良和他的高级将领在一起



直皖大战中联手的吴佩孚(右)与张作霖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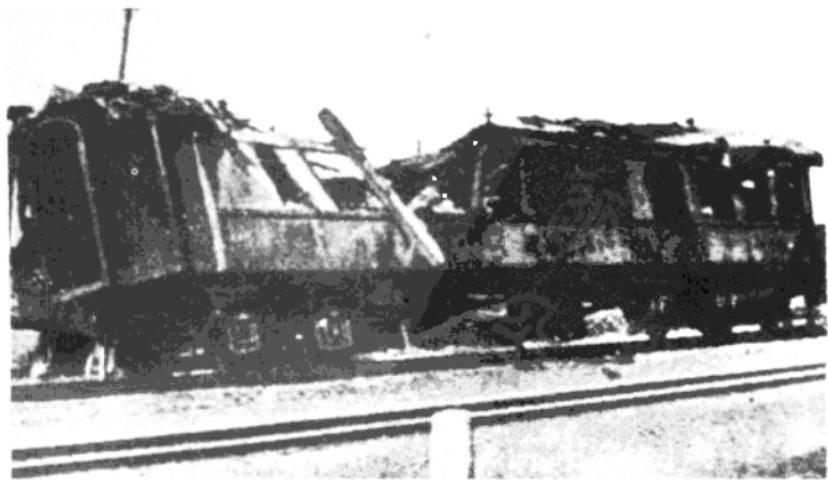
1926年6月,直系首领吴佩孚(左三)由长辛店抵达北京,会晤奉系首领张作霖(左四),以期解决北京政府善后及联合进攻国民军等重大问题



1928年9月奉军与直鲁联军发生战争,图为被炮击的奉军阵地



1928年6月4日，奉系首领、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的专列在皇姑屯附近遇炸，张作霖伤重而死。上图为遇害前的张作霖，下图为被炸的车厢



# 前 言

人民创造历史，但历史由风雨和血泪写成。其中每一个苍凉的文字都充满战火、硝烟。无论历史积淀多少时间，过滤多少细节，积满多少灰尘，淘汰多少英雄好汉，只要你接近它，只要你轻轻地触摸或小心翼翼地打开它，你总能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气息，或沉默、或嚎叫、或哭泣、或呐喊；你总能感受到一种无可回避的虚幻和真实。它像一道虹、一扇门、一堵墙、一块石头，乃至一个毫无表情的老人，我们总能感受到它那“燃烧的宁静”和无处不在的阴影。在寂寞的午后，在黄昏，在落雨的晨光中，我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近历史，置身于昨天的风暴。

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历史恰似埋在地下的莲藕，它是由一节一节联结起来的，每一节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和主题词。此时此刻，我们面对的是很近但又很远的一部分。我们面对它，一如面对一所饱经风霜的房子。

19世纪40年代，英帝国主义用炮火轰开了满清皇朝紧闭的大门。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根基开始动摇，古老中华的车轮蹒跚却又坚定地驶入了到处都是祸乱和血腥的近代历史。

1911年，充斥着愚昧和腐朽的大清帝国在辛亥风云中轰然坍塌，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国。皇帝没有了，大大小小的军

阀却为了各自利益，又迫不及待地粉墨登场。他们中最大的窃据中央政权，小一点的割省霸市，再小一点的则拥武一隅，作威一方。军阀间争权夺利，你杀我砍，一时间将神州大地搅弄得支离破碎，乌烟瘴气，民不聊生！

总而言之，“民国”徒有其名。

某种意义上说，本世纪上半叶的军阀混战史，就是一部民国祸乱史，就是一部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小丑表演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血泪史。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不可一世的大小军阀早已被历史的尘烟掩埋得踪影全无。然而，他们祸乱中国数十年，在整个民国时期的政治和社会舞台上占有显著位置。他们用刀光斧影在民国史上写下的黑暗和罪恶是任何风雨和漫长年岁也打磨不了的。

俗话说，前车覆，后车诫。作为挚爱这片古老土地的热血青年，我们对此深以为然。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好好地研究一下。

于是，5年前的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庄重地翻开了民国历史，开始在布满史学者们辛勤足迹的卷宗里艰难地潜行，认真寻觅着某种意外，渴望得到某种收获。

不久，我们被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吸引住了：在民国时期的大军阀中，虽然他们生前呼风唤雨，显赫一时，却居然有二十几个死于非命，未得善终！稍稍归一下类，就不难发现，他们中有被刺杀的，比如张作霖、张敬尧、孙传芳、张宗昌、徐树铮、王文华、杨增新、李生达、谭浩明；有被处决的，比如韩复榘、陆建章、石友三、王天培、杨宇霆、郭松龄、刘珍年；有被毒死的，比如吴佩孚、赵秉钧、刘湘；还有自杀的，比如阎相文、李纯，等等。

军阀们拥兵自重，权倾一时，威震四方，竟有这么多人不得好死，是偶然现象，还是因果报应？

掀开盖在历史身上的玄色陈衣，我们意识到，这背后一定有着错综复杂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军事的等各个方面的因素。

当我们逐个去探究这二十几个军阀的生平事略和所作所为时，我们不仅渐渐弄清了他们死于非命的前因后果，而且还有了新的发现。

就死于非命的原因而言，这些军阀大多印证了“多行不义必自毙”之俗说。尽管军阀们势大权大，但改变不了他们因作恶多端而铸成的人生悲剧。

这些军阀有的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例如赵秉钧，他是袁世凯的头号爪牙，官至直隶都督兼民政长，权势不可谓不大。但由于他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一事做得不干净，让国民党追查到了袁世凯的头上；袁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就毫不犹豫地“煮”了赵这条“走狗”。

也有成了军事失利的替罪羊者。例如韩复榘，当日军汹涌南下时，蒋介石要他在山东守住黄河；而他与蒋素有矛盾，又恨老蒋撤走李宗仁调给他的炮兵，一气之下一枪未放就下令全军后撤了，结果日军轻易突破黄河天险，直指中原，使抗战形势骤然严峻，最后被气急败坏的蒋介石枪毙了。

还有的则死于怨怨相报。比如徐树铮，他于1918年枪杀了直系军阀陆建章，而陆是冯玉祥的姑父。1925年，冯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兵力有数十万之多。他念念不忘杀亲之仇，便命部下用计将徐枪杀于廊坊车站，报了一箭之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至于我们新的发现，则在于对这些军阀的认识和看法上面。说起军阀，人们对其的普遍印象不外乎是凶恶残忍，嗜杀成性，胸无点墨，粗野张狂，是地地道道的“混世魔王”。然而，当我们在细细研究军阀们的身世和事略后，我们认识到对他们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虽然，我们无意为某个军阀唱赞歌，但正如十指长短不齐一样，军阀们的层次高低各不相同。

事实上，无论在政治表现上，还是在社会生活上，军阀们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即使是同一个军阀，其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

比如奉系军阀郭松龄，他生活简朴，治军严谨，心怀大志。起初，他跟着张作霖不明不白地干过不少事，但当革命形势发展时，他同情革命，倾向进步，最终扯起了反奉大旗，与那些反对革命、仇视工农的军阀有着明显的区别。

又如吴佩孚，他在大革命时期双手沾满了工农群众的鲜血，是名副其实的反动军阀；但他在亲眼看到日本人炮轰蓬莱阁，将我中华名胜毁于一旦时，他义愤不平，喊出了“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收复旧山河”的豪言壮语；吴失势之后，日本人数度拉他出山，他死活不愿为日本人出力，不久竟惨死在日本军医的手术刀下。

诚然，一两个军阀表现出来的进步，一个军阀所做的一两件好事，并不能改变军阀这个群体的反动本质，并不能掩盖军阀们的滔天罪行。只是，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全面地看待问题，可能会显得客观、公正些。

正因为此，我们便将我们的研究结果和发现用自己笨拙的笔写了下来，断断续续地写成了这本书。由于时间仓促，对我们有用的史料有限，我们只完成了 22 个死于非命的大军阀的